

當前世變與三民主義

羅時實

生在這一時代人們，無論貧富或不同的地位職業，只要他不是白癡，或自我陶醉，都會感到有所缺失。人們在二次大戰以前，多為工作沒有保障而感到不安。現在凡是粗具工業基礎，走上開發途徑國家，多少都有一些社會安全措施。為失業感到的恐懼，比起前一代是減少了。可是更擔心的是他生存的社會，能否讓他長久自由生活下去。在他出生的這一代已經幾次看到成億和以千萬數計的人口，並不因本身有何罪過，而忽然被關進鐵幕。他也意識得到，生在這一具有毀滅性的核子時代，整個人類可能會在俄頃之間因少數人的瘋狂，而遇上世界的末日。

人們似已習慣着在矛盾中生活。隨處聽到的都是和平呼聲，實際却無一方不是為應付戰爭，作積極準備。人人都知道自由可貴，可是每年都有千千萬萬人們先後失去珍貴的自由。人類是因知識發達，用於科學研究與工業技術而有今日的物質文明，也因物質文明發達臻於極致，製造出這一系列能毀滅人類自身的武器。現在又因敵對的壁壘都已有了這同樣武器，要在數量和殺傷力上勝過他而欲罷不能。

人們都為世局變化多端而感到困擾。的確，劇變與加速之變是這一時代的特徵。但變是宇宙常態，沒有變世界不會有進步。應變——使變朝向進步發展，則需有最高智慧與智慧之正當運用。古往今來曾有不少聖哲為適應世變用過心思，有所指示。但概括而具體的，則無過於國父孫先生的三民主義。孫先生於世紀初期曾明白指出，人類歷史演變有三種綜合趨向，他指示國人要利用一次大的革命，解決這三大問題。

經過二次大戰，他所指示的幾項原則都能得到事實證明。先講民族自決問題。二次大戰之後，因勝負雙方俱已筋疲力盡，在首次大戰提出要求，未獲解決的，至此已使舊日列強非放棄侵略政策，無法自存。這樣才使長期屈伏，積怨甚深，淪為殖民地的許多民族，紛起作建國運動。民族主義浪潮在這一時代奔騰澎湃，有沛然莫之能禦形勢。

為戰後民族主義留下的絆腳石是共產主義。共產主義目的是要以無產階級征服和統治世界。這和民族主義精神是不相容的。當前問題是由於這些新興國家之中，有的在與舊日帝國主義者奮鬥之時，引入共產主義為其助力，因此糾纏不清，在取得獨立之後，仍不易擺脫它的羈絆。另一原因是在國際糾紛之中，憤對方有外力支援，遂亦不惜飲鴆止渴，接受共產國家的援助。今年幸未釀成世界大戰的中東衝突，便是此一例證。

散處各地的猶太民族有數千萬人，其應有一屬於自己的國家，原亦無可非議。不幸這一為當時美英法人代為選定，和猶太具有深長歷史關係的國土，却處在回教阿剌伯人環繞之中。因此來自各方的猶太人不能不戒慎恐懼，為防禦外來攻擊，而萬眾一心，配合卓越的軍經建設，形成稀有的團結力量。

所謂外來攻擊，無論潛藏與實際行動均來自阿剌伯世界的敵對。從猶太和西方一般人看，建立以色列是使流亡二千年的猶太人可以重返家園。對一般亞洲人言是在他們的土地範圍內多了一個帝國主義的前哨站。對阿剌伯人則特別另有一種感覺，認為這是沒有耕作權的外國人，佔據了屬於

他們的土地。因此，以色列國是必然要打仗的。從建國之日開始，就遭到埃及、伊拉克、約旦、黎巴嫩、敘利亞的攻擊。到一九四九雙方疆土仍如聯合國的規定，未曾有所增減。一九五〇曾由英美法三國共同宣言，維持巴力斯坦原狀。再經兩次戰爭，勝利均屬以色列，尤其六年前的一次在六天之內把整個埃及的戰力毀了。由於兩個民族之間在現代化工作表現，相形見絀，支持以色列的美國在處理國際事務上領導無方，蘇俄則一直伸出友誼之手，這樣才逼使阿聯向蘇俄求助。因蘇俄提供的技術與最新武器，才使戰爭延續兩旬，以色列受到嚴重損傷。

不管即將舉行的日內瓦和平會議能否為中東和平，找到解答，可以引發世界戰禍的中東危機必須得到解決，則為舉世有識之士的共同祈求。這一地區從以色列建國時起，一直是紙包火種，隨時都可以燃燒起來。因此，要使問題獲得解決，必須關係各方先在心理上有所改變。承認任何民族有權保有合理的生存空間，是民族主義的不易原則。逾此範圍，凡以武力攫取的擴充土地，必須歸還原主，以免留下火種，再釀另一危機。根據此一原則，獻太人有權生存，以色列獨立應該受到尊重。為使此一原則有效，應由當前兩大超強與過去具有關係的大國，在條約上給予保障，使以色列人心理上安全感，維持永久中立，成為中東瑞士。能如是猶太人便可憑其民族秉賦，在科學研究與工業技術上為人類貢獻才智，不再成為世界和平的問題。

國父孫先生的民族主義係以民族獨立為手段，而以大同世界為最後目的。因此，他希望中國人在獲得本身的獨立自由後，要以扶危濟傾精神，助其他民族獲得自由平等。今天的世界只有共產國家是與此背道而馳，其他開發國家似乎都已了解這一原則，走向這條路了。

*

*

*

從政治觀點，今天世界是自由與奴役的對立。但因民主國家仍存在許多弱點，因此民主政治有時也會成為指摘的對象。美國是對民主政治具有長久傳統的先進國，其各種職位的選舉却一直未能擺脫金錢的間接影響。雖然每一公民都經憲法規定，有自由選舉議員及政府首長之權，真正的選擇却仍是報紙、雜誌、廣播、電視的所有或主持者替他們代行。因此，不

管美國近年在政治上怎樣力圖改革，僅從最近一年的各種表現，這一公開社會仍未完全免除富人政治的譏評。事實上這也是環境造成。百分八十的美國人都住在都市，各人都為自己的工作忙碌，單憑人與人的接觸，要在三十左右成爲全國知名，即使是政治天才，亦談何容易。經過報紙電視雜誌廣播加以渲染，便能於頃刻間成爲全國性的人物。這類大眾傳播工具在此時多數國家都是私人所有，聽由所有者支配，因此所謂選舉云云，仍是那些長袖善舞的財閥政客從幕後操縱。從商業廣告把欺騙消費者，視作一種生活藝術，在大學作為教學研究，人們似已習而不察，逐漸且亦視爲當然。等到多數人都能發覺了解這是一種欺騙，可能在不久將來人們會把「免於欺騙的自由」，列爲要求自由之新的項目。

民主政治一直在不斷改進，從未有認爲這是無瑕可指的政治組織。人們愛好民主是因這種社會重視個人人格尊嚴；在法律許可範圍內人們可以自由追求自己的理想；有能力的容易憑其對社會所作貢獻，取得適當地位與應有報酬。這原是一種彼善於此的政制，說不上怎樣完美，却比其他政制容易走上進步之路。國父孫先生贊成民主政治，是因人民有權容易促成團結，有利於中國革命的進行。但他並不主張和日本一樣，亦步亦趨，跟着英美的後面走。他的民權主義主張維護中國固有的考試制度，是要以考試濟選舉之窮。因考試比較容易甄拔真才，能使財力不裕者有上進之路。所以他要擯取中西之長，斟酌至當，以彌補民主政治已經發現的缺點。

除此之外，他還強調民主政治的道德因素，認爲中國「大學」所稱修齊治平，由內而外的政治哲學，是人類社會意境最高的政治哲學，能對西方缺點有所補益。西方社會過於重視物質，認爲能在經濟事業上有成就的，轉任政府工作亦能有所成就。遂使一般心理以爲只有富人適任政治工作，即使有少數人其本身初非富有，亦能從富有者取得資助。成功之後遂不免受到財富支配，或以國家名器用作酬庸之資。因我們此時正在試行民主政治，不少人以爲可以取法英美，不知美英尚在隨時講求改進階段。取法乎上，僅得乎中，若僅以美英現狀爲取法對象，即使唯妙唯肖，而品斯下矣。

*

*

*

國父在世世紀初期僅有三民主義的思想輪廓時，即預言二十世紀將是民

生主義擅場時代。這時共產主義尚在研究與宣傳階段，一九一七俄國革命後，布什維克在混亂中取得政權，是對當時資本主義經濟給予首次警報。但首次大戰結束，英法當局如路易·佐治，和克里門梭都為勝利沖暈了頭，使盡一切蠻力向戰敗的德國榨取。只有一位衆醉獨醒的中年經濟學者凱恩斯，看清楚德國絕無依照英法開出條件，賠償能力，強力榨取結果，只能把德國逼上通貨膨脹之路。通貨膨脹則是通往共產主義的捷徑。

凱恩斯原是英國參加巴黎和會財政部代表，他為主張未被採納，乃辭職著書。他的大著「和平的經濟後果」The Economic Consequence of Peace 雖被譯為十四國文字，對英法勒索態度却未發生任何影響。只有蘇俄的列寧特別欣賞他的見解，認為是最能了解共產主義的人。馬克斯的共產主義是以當時工業革命先進的英國為研究對象，俄國工業在歐洲比較落後，論理不應使布什維克取得政權。列寧為此曾有甚長時期感到困擾，至一九一六乃想出愚昧，貧困，和紊亂是在落後國家培育共產主義的溫床，乃以「帝國主義——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」為題，發表小冊子，勉強把經濟榨取和貧窮混亂聯在一起，作為共產主義發展的理論。從此時起共產黨即以製造混亂貧窮為謀取發展手段，所至之處都是先在地方造成混亂，使人民不安生業，到大家都一無所有之時，便失去理智，不能分別善惡，甚至為勉強偷生，跟隨他們作暴亂工具。

三十年代的經濟恐慌更使他們獲得鼓勵。知道所謂民主自由，與個人人格尊嚴，只是在生活中生活充裕，衣食不缺時，少數富人之自我陶醉。待至失去工作，一家衣食無所取給時，為圖哺啜，便無所謂廉恥和有所不為之事。這時世界共產黨員人數皆以直線上升，許多社會知名之士如英國的蕭伯訥、韋伯夫婦都曾對共產主義有過讚美之詞。

從大戰尚未結束時起，英國即為對付共產主義威脅，提出由威廉貝佛里治草擬的社會安全方案。並不惜犧牲戰前超強地位，盡全國財力，貫徹實施。在工業高度發達如美英等國，受薪階級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，一旦失去工作非坐以待斃，即挺而走險。共產集團是以沒有失業作標榜，民主世界便應針對人民的恐懼心理，給予安全保障，使他們在得到「免於匱乏的自由」之後，才能分辨善惡，為維護自由而努力奮鬥。共產集團

能使其奴工得到衣食，民主世界則使其人民享受更好之人的生活。這就是當前世界自由與奴役的比照。

國父在五十年前，中國知識份子對社會主義初有一知半解之時，即明白指出中國的大患是貧。中國因未經工業革命，除殘民以逞的軍閥，和為外商作中間人的買辦而外，當時認作富人的，比之外國資本家，亦只是大貧小貧而已。救貧之道只有從生產着手。因此他為中國工業化策劃的產業革命，是和從公平分配着眼的社會革命同時進行，以畢其功於一役。這和二次大戰之後一般流行的經濟政策，強調經濟成長，同時利用累進率的直接稅制，截長補短，以擴大中產階級人數作法，完全符合。

國父雖未及身取得政權，他對政府任務之新的看法，則和今日福利國家所持觀點，非常接近。福利國家是把生存看作基本人權，國父則稱人民有向政府要求衣食住行的權利，政府有為人民供應衣食住行的義務，並以政府在這一方面的成績作為考核政府好壞的標準。

國父畢生最大願望是經由一次大的革命，使中國成一現代國家。現代國家的特徵是高度工業化，只有工業化，才能使生產豐富，生活優裕。他從不憎恨富人，而是要使大家都富。所以他說，實行民生主義是要使大家發財。他講演民生主義之時，正是國內思想非常龐雜，共產黨已在國民黨內發生滲透與蠱惑作用。因此他在民生主義規劃的社會革命，是從預防入手，預防走上舊日資本主義的失敗路線。另一就是不受共產黨的蠱惑，強調生產，共富而不共貧。關於前者，英人陶納 R. H. Tawney (1880-1962) 曾於訪問戰時重慶時，對後方從事工業的新興企業家發出警告，要他們切勿重蹈英國工業革命前期的覆轍，了解工業使命是衣被衆生，使大家同沾福利，不是專為少數人發財着想。因他了解民生主義精神，故及時勸告，足以發人深省。

現在我們的工業革命已逐漸接近茁壯階段，受國際局勢影響，到處呈現動盪狀態。在變化多端情況中，我們的工業正在接受另一新的時代考驗。怎樣把握局勢，使其朝向增進大眾福利的方向發展，不使少數人獨佔厚利，違反民生主義共富精神，希望主管當局與具有遠見各企業家能時刻警惕，不使再有偏差，擴大財富分配的距離。(完)